

反思与重构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文学价值刍议

郑 玲

(宁夏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民族古籍文献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流布,西域出现了很多极具文学艺术价值的佛典,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即为典型代表。《弥勒会见记》是一部融宗教色彩和文学创作于一体的翻译作品,不但开启了回鹘民族戏剧文学创作的先河,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剧文学作品。历史遗存的形象性和珍贵性决定了《弥勒会见记》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值得我们反思其文学价值,重构其文学地位。

关键词: 民族文献 《弥勒会见记》; 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6)06-0250-04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创立于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的古印度,延至公元前 3 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第三次佛教集结后,印度佛教开始在南亚地区广泛流布,并传衍至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地区。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学界颇多争议。一般以为约公元前 1 世纪时“佛教由罽宾(迦湿弥罗)向东越过葱岭进入于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于阗成为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1]。

佛教传入新疆后,便得到城郭诸国王室的接受和支持,迅速在新疆各地传衍和流布。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发展成为新疆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有唐一代,国力鼎盛,西域一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西域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达到了历史巅峰。佛教在西域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独具西域特色的民族文献典籍,其中尤以佛教典籍的交流、传译为甚,其时产生了诸多极具文学艺术价值的佛典如《弥勒会见记》、《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经》和《本生经》,等等,其中以《弥勒会见记》为其典型代表。

一、佛教文学译典——《弥勒会见记》

《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 28 幕(1 个序幕和 27 个正幕)的佛教说唱剧本,以讲述弥勒生平事迹为其主要内容。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剧文学作品,《弥勒会见记》目前主要保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德国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学界以该文献的发现地将其分别命名为哈密本、德国胜金口本和德国木头沟本。若以该文献的记录语言归类,存世的《弥勒会见记》主要有两大语言版本,一为以吐火罗文为书写载体的文本,一为由回鹘文书写而成的文本。

在回鹘文哈密本的《弥勒会见记》的序章中,译者明确指出该文本并非回鹘语的原创作品,而是一部由古印度文转译至吐火罗文再至回鹘文的翻译之作。在二度翻译的过程中,回鹘文本译者采用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运用长达 28 幕的篇幅,详细讲述未来佛弥勒弘扬佛法、普渡众生的传奇故事。

该文本的序幕为佛教义理的说教和施主所写的功德回向;除去序幕和尾声(第二十七幕)两部分外,第二至二十六幕为该剧的主体,主要描述聪颖灵

收稿日期: 2016-09-10

作者简介: 郑 玲(1979—),女,河北石家庄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回鹘文献与文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项目编号: 14CYY039)的阶段性成果。

慧的弥勒自幼拜跋多利婆罗门为师修行,一天,跋多利婆罗门梦中受天神启示,得知释迦牟尼佛已成正觉得佛果,此刻正在摩揭陀国孤绝山上布道说法,只因自己年迈体衰、老态龙钟而不能长途跋涉亲见佛祖,十分遗憾,于是派弥勒等16位弟子出家修道。此后佛祖释迦牟尼到波罗奈国讲经说法,讲述未来佛弥勒的故事,弥勒听后便向佛陀请愿要求自己愿作解救众生脱离苦海的未来佛。之后作品描述了弥勒菩萨升上兜率天之情,后因怜悯受苦众生,降生于一大臣家中,又因“宝幢毁坏”感悟无常之理,弃家成道,终在龙华菩提树下修成正果,又于大小地狱之中解救受难众生。

笔者以为,在已知的回鹘文佛教典籍中,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文学戏剧价值斐然,原因如下:其一,《弥勒会见记》是融宗教色彩和文学创作于一体的翻译作品。据该文本的跋语可知,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母本最初用“印度文”(ānātkāk tili)写成,分别经由圣月菩萨大师(aryačantri bodiswt kši ačari)和智护戒师(prtnarakšit kranwanziki)之手,历经由古印度文到吐火罗文再到突厥语的二度翻译,不仅是一部描述未来佛弥勒生平事迹的讲经文书,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再创造的译典。其二,《弥勒会见记》是西域戏剧剧本的滥觞之作,可以为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提供参考价值。内容宏富的回鹘文佛教经典——《弥勒会见记》在严谨紧凑的场景结构中,运用古朴典雅的人物语言对白,贯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将众多耳熟能详的佛教人物形象,诸如释迦牟尼、弥勒、跋多利婆罗门、王阿那律、摩罗罗尼等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因此,耿世民先生在论及《弥勒会见记》在西域戏剧史中的地位时曾感言:“自古以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不仅以歌舞之乡闻名于世,而且还以最早表演戏剧闻名于世。在历史上,新疆戏剧对内地汉族戏剧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很大作用。”^[2]可见,《弥勒会见记》不但开启了回鹘民族戏剧文学创作的先河,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剧文学作品,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之研究现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等地出土了为数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关涉佛教。这些文献填补了诸多历史记载的空白,为研究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

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伴随着回鹘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的《弥勒会见记》的相继发现、刊布与释读,对该文献的相关研究进行重新总结回顾、梳理与前瞻,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一) 国内研究现状

1959年新疆哈密发现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以冯家昇的《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年第7、8期)一文为标志,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研究路径主要有三:其一为文本内容的释读与刊布,如耿世民(1979,1980,1982,2004,2008)、伊斯拉菲尔·玉素甫(1987)、多鲁坤·阚白尔(1989)、李经纬(1982),等等;其二为语音、词汇等语言学研究,如伊斯拉菲尔·迪拉娜(2005)、热孜亚·努日(2006)、柳元丰(2008)、艾力·阿布拉(2011),等等;其三为对该文献文学剧本特征的讨论,以黎嫱(1986,1990,1999,2003)、郎樱(2002)等为代表。此外,对于不同语言版本的《弥勒会见记》展开的对勘研究亦开启了学界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路,尤以张铁山为代表。他首次运用对勘之法对两文本展开逐页逐句比较,标注差异,进行语言学、文献学、佛教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尝试。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范式单一,多从文献学、语言学层面释读该文献,介绍性著述占主流,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尚未展开。二是研究总量不足,成果较为单一。除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1)》和耿世民的《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是唯一的两部转写和翻译性质的专著外,其余均为学术论文,同质性研究较多,理论性有待提高。三是研究视域相对狭窄。由于研究者学科背景多集中于古代突厥语和文献学领域,缺乏相关学科如文学、翻译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术积累,因而多学科交叉性研究难以展开,尤其是以文本对勘之法对哈密本《弥勒会见记》进行的综合性考察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不失为一个潜在的学术增长点。

(二)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弥勒会见记》起步早,著述丰富,已由宏观走向微观,由释读、刊布等基础性研究转向文本对勘和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业已形成语言文学研究的国际范式。早期研究是以葛玛丽·冯加班(A. v. Gabain 1957,1961)和色那西·特肯(Ş. Tekin 1980)为主要代表的文献释读、刊布,而2008年以来研究开始转向多文本对勘和跨学科解读,成

果频出,如 Peter Zieme 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及其可能存在的平行本》、Georges-Jean Pinault 的《〈弥勒会见记〉之平行本吐火罗文本对回鹘文本之影响》、Jens Wilkens 的《“新日”与〈弥勒会见记〉——中世纪宗教问题研究》、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的《柏林吐鲁番研究中心藏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之比较研究》、Yukiyo Kasai 的《古代突厥中的弥勒信仰源起考》、Jens-Uwe Hartmann 的《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之比较》、Dieter Maue 的《一个被忽略的回鹘词语〈m'ytry〉的语音问题研究》以及 Ablet Semet 的《回鹘弥勒信仰的历史研究》等。但受所藏文献版本之限,研究对象以德国胜金口本和木头沟本为主,而对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研究则鲜有论及。

三、反思与重构《弥勒会见记》文学价值再思考

纵观世界文学史,“所有国家戏剧的起源几乎都与宗教活动有关”^[3]。可以说,西域戏剧的形成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如影相随。在前伊斯兰时代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佛教文化始终以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影响着西域诸民族的生产生活。作为古代西域民族之一的回鹘,从漠北高原西迁并定居西域后,曾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参与了与当地民族融合的过程,吸收异质文化并为己用。20 世纪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哈密、焉耆等地,先后发现并出土多语种的戏剧文献,这些文献或为梵语,或为焉耆语(吐火罗 A),或为回鹘文,就其性质而言多为佛教宗教剧本。

在数量丰富的回鹘文佛教写经中,讲经文书占居重要地位,它们大多为譬喻经或本生经,极受普通佛教信徒的喜爱,其中译自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在回鹘佛教讲经文中极具特殊意义,主要原因在于它并非靠单纯呆板的说教向广大信众灌输佛教思想,而是成功地运用舞台表演的形式将枯燥无味的佛教理念转化为有鲜活灵动的故事情节,极富艺术感染力。

伴随着诸多戏剧文献的陆续出土和刊布,为重新思考和再度审视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发现表明,通过佛教经典的传译,回鹘人学会了来自古印度的戏剧表演,并且将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活学活用,经过再次创作,使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文学风格异于吐火罗文本。这也为古印度文学在西域的传播史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历史遗存的形象性和珍贵性决

定了《弥勒会见记》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无论是吐火罗语本还是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作为出土于西域的戏剧史料,它们对于讨论影响中国戏剧产生发展的外来影响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弥勒会见记》的文学归属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它是指图讲故事的底本,或为讲唱形式,抑或剧本雏形,但终归不应忽视此中所包含的戏剧文学的要素,该剧本中有幕,又细分为多个场次,有明确的演出时间、地点和场景,还标明了出场人物及演唱曲调,并由此向我们展示了史诗型壮阔宏伟纵横捭阖的戏剧艺术结构,时空转换跨度极大,上及天堂,下达地狱,大千世界,无所不包;近至时下,远推亿年,纵横驰骋,无所不及。其舞台艺术规模较之古希腊戏剧和古印度梵剧增扩不少,这也充分证明了在西域这片热土上,聪明智慧的回鹘民族以其开放的胸襟积极吸收异质文化因子,并将其有机融入传统文化的积淀层,创造性发展了兼具古代东西方各民族优秀戏剧文化的融合体。

对于中国戏剧的形成这一命题,学界普遍接受发端于宋末的杂剧,形成在元明时期这一观点。这里我们援引王国维对戏曲概念的界定:“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4]这一定义牢牢抓住了戏曲的基本特征,继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对戏曲的认识和判断,提出“真戏曲”的概念,并认为,称得上意义始全的真正的戏剧应为“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4]。通过对中国戏曲漫长的历史过程和大量翔实史料的考证,对于戏剧形成及其断代,王国维得出了“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4]的结论。

诚然,中国戏剧发端于宋末的观点是在未将西域戏剧纳入考度范畴的前提下得出的,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因此,正视以《弥勒会见记》为代表的西域戏剧的存在及其对中原戏剧形成作出的贡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进而反思西域民族戏剧是否应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为我们客观而全面审视中国戏剧发展史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作为西域戏剧剧本的典范之作《弥勒会见记》的发现,打破了“西域无戏剧”的学术猜疑,甚至将中国古代戏剧的历史提前到了隋唐或者更早的时候。^[2]对于吐火罗语文本的《弥勒会见记》,季羨林先生以编号为 76YQ1. 11/25 片段为例加以分析断代,认为该文本形成的年代应为隋唐时期,早于戏曲

繁荣的宋元时期,并且进一步肯定了戏剧这一文学体裁兴起的区域不在中原,而在西域。

笔者以为,以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为例,无论以该剧本的书写字体还是以功德回向的文字描述作为断代依据,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该剧本在西域的形成与流布的时间最晚不迟于公元8世纪左右。而作为西域戏剧时期的代表作,《弥勒会见记》的出现远远早于中原戏剧的形成,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西域戏剧对内地汉族戏剧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形成相当的影响力。可见,无论在西域戏剧史上,还是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弥勒会见记》的里程碑意义不言而喻。以《弥勒会见记》为代表的西域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和贡献突破了戏剧成熟于元杂剧的传统观点。

在《弥勒会见记》中,有主题突出的故事内容,

情节完整且环环相扣;有专供演员演出而设置的场次背景,并配以人物演唱的曲调;有饱满丰盈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若以王国维先生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标准予以衡量,《弥勒会见记》不失为一部戏剧意义始全、文学色彩浓郁的剧本,它既不同于印度梵剧,又有别于中原戏曲,是我国少数民族戏剧中形成时间较早、艺术形式较为成熟的一个特殊的戏剧品种,是汉唐以来中西宗教与世俗文化交流的光辉结晶。反思《弥勒会见记》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的价值,重申民族戏剧在中国戏剧史中的地位和贡献,其意义绝不仅仅囿于彰显某个民族在中国戏剧史中的贡献,而在于通悉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历史范式以及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历史架构,以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力提供多民族佐证。

参考文献

- [1] 任继愈. 佛教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0.
- [2] 耿世民. 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J]. 文史,1982(12).
- [3] 季羨林. 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J]. 社会科学战线,1990(1).
- [4] 王国维.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201,36,68.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Literary Value of Uighur Script “Maitrisimit”

ZHENG L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inchuan, Ningxia, China, 750021)

Abstract: The ethnic literature is the carrier of minority's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and valuable asset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spread and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many great Buddhist scriptures with literary and artistic values appeared, in which Uighur Maitrisimit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Maitrisimit is a piece of translation work integrated with religious and literary creation. It not only opens the Uighur ethnic drama literature precedent, but also is one of the earliest extant works of dramatic literature. The historical relics and precious image of Maitrisimit decided its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ama, which deserves people's reflection on its literary value to reconstruct its literary status.

Key words: ethnic literature; Maitrisimit; literary value

(责任编辑 白洁)